

作序漫談



幾年前，我出書請北京一位名家作序，因是交往多年朋友，礙於面子，他雖沒拒絕，但應允也不那麼痛快，很無奈地表示：「為人作序都作怕了。」我當時頗以為他是故作矯情，心想，我倒是想給人家作序，還沒人找我呢。

沒想到，這才幾年過去，竟也有人請我作序了。去年初冬，我在大學教過的一個學生，也是文壇上嶄露頭角的青年文作家，要結集出版，要我作序。我當時很是吃了一驚，問：「放着那麼多的大家名家不找，怎麼會找到我的頭上？」他說了一個讓我無法推辭的理由：「你是我的授業老師，我的第一篇雜文就是在你的指導下發表的，你對我最了解。再說你的名氣也不小。」想想他說的話也有道理，特別是後一句話尤其受用，「小高帽」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我就忐忑不安也有幾分竊喜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劉勰有云：「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作序，當然要把全部作品看一遍吧，於是放下手裏的活，用了一星期把三十萬字的書稿看了一遍，有了點粗淺印象。可要總結出作者的寫作風格，點出他的有待改進之處，恐怕還得再來一遍精讀。於是又花了近一周時間，邊讀邊記，心裏大致有了個譜。又寫寫改花了一三四天，這兩三千字的一個序，就用去我近二十天的時間，直到此時，我才體會到那位名家害怕寫序的苦衷，隱隱也生出一點「怕」來。

可是今年一開春，就有河北邯鄲一個青年作者找上門來，請我作序。小伙子言懇意切，又給我戴了不少高帽，說是對我仰慕不已，看過我很多文章，欲借得我之大名為他揚腕。我這人耳朵根子軟，經不起人家三句好話，也不好意思回絕，就硬着頭皮又接了這「活」。用了十天左右，總算把这个序完成了，作者也十分滿意，我雖然辛苦一點，但也小有安慰。

進了六月，四川綿陽一個作者也「慕名」請我作序。一開始我倒是拒絕了，可人家三天一個電話，五天一個郵件，一再懇求，頗有誠意。我們心自問，自己雖在業內有一點虛名，多寫即篇文章，還不至於有這麼大架子可擺吧，人家請我作序，那也是看得起我，我可別不識抬舉呀！於是，又很無奈但也算認真地給人家寫了個序，費時一周。

近日無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說是許多老作家都曾為給人作序、當名譽主編、開會、應酬而不勝其煩。曹禺晚年原有一個大的寫作計劃，但由於終日忙於給人作序、開會應酬，結果計劃落空，一事無成，最後，鬱鬱而終。當然，也有人特別喜歡為人作序，最著名的就是梁啟超。一九二〇年，蔣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請梁啟超作序。梁蕩開其史筆，半月之間成洋洋灑灑三十三節，五萬多字，跟原書的字數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

明代顧炎武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序。」這話有些武斷，其實為人作序多出於無奈。有了幾回作序經歷，我突然悟出一個道理，文人們年輕時要請人作序，年老時才有資格給人作序，所以，當有人請你作序時，你千萬別太得意，這可能意味着你已經老了。想到這裏，平素從不照鏡子的我不由攬鏡自觀，果然額頭已溝壑鮮明，目光已漸趨渾濁，白髮也悄悄爬上兩鬢，我不得不很痛苦而又很無奈地承認，自己老了。

陳魯民

「草木凋」還是「草未凋」

顧農

杜牧的《寄揚州韓綽判官》是一首名作：「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關於此詩有一大疑義，就是第二句的「草木凋」，也有些本子裏作「草未凋」，通行本以「草木凋」較多見。兩種文本都講得通，當以何者為是？

詩無達詁，最容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最好玩的，也許是俞樾（字蔭甫，號曲園，一八二一年至一九〇七年）、俞陛雲（字階青，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五〇年）祖孫各執一說，適成兩軍對壘。

祖父俞樾說，如果單看這一句，則「草木凋」、「草未凋」皆無不可，「若以全首論，則改『未』字不通矣。此詩作意全在『草木凋』三字。蓋『青山隱隱水迢迢』言其地之勝也，『秋盡江南草木凋』言雖有勝地，而惜乎非其時也。故繼之曰『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無限感慨。若改作『未凋』，則勝地自故，何處不可教簫乎？詩意全失矣。此乃感嘆之詞，非讚美之語，讀之令人有生不逢時之感。」（《九九消夏錄》）孫子俞陛雲說：「首句言列岫橫雲，遙波蕩夕，謂揚州之遠也。次言芳草一碧，未覺秋寒，謂氣候之美也。後二句言，當年念四橋頭，飛羽觴而醉月，聽微風之過簫，濃情化酒，滴滴皆甘。今宵明月依然，何處問玉人蹤跡？洵如其《遺懷》詩所謂一夢青樓，真成薄幸矣。」（《詩境淺說》續編二）

手上的一票，不知道投給誰好。查其他人的評論，贊成「草木凋」、「草未凋」的都有，似以後者為多。如楊慎《詞品》卷一云：

「賀方回作《太平時》一詞，衍杜牧之詩也。其詞云：『秋盡江南葉未凋，晚雲高。青山隱隱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橋明月夜，弭蘭橈。玉人何處教吹簫，可憐宵。』」按此，則牧之本作『草未凋』。」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云：

「『秋盡江南草木凋』言江南地暖，『未』訛為『木』，失原旨矣。昔人藏書少而善本最多，近人善本少而藏書易多，坊賈射利，肆行點竄，殆亦文字之厄與！」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卷八云：

「杜牧之『秋盡江南草木凋』本作『草未凋』，坊本尙有不誤者，作『草木凋』便無意味矣。此誤字之當校者也。」

揚州深秋草木的情況如何？我寓居此地多年，深知它們多半不凋。唐朝大約也是如此吧。

這一票決定投給「草未凋」。「草木凋」當然亦可繼續存在，同為佳句。

至一九六七年寫作了一八八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一八八一年出生的是魯迅。書中有處硬傷，是將周作人出生去世的年份全寫錯了，一八八五年。書出版時，曹聚仁已去世一年多。老先生去世前為疾病折磨，校對的自然無力為之，否則應該不會出此差錯。

曹聚仁與魯迅雖為朋友，觀點立場上還是頗多分歧的。曹聚仁從《周書》中抽出自己的信，大約對公開這書信頗有顧慮。曹聚仁會給魯迅去信說：「信中說胡風性詐黃源行詔那幾句，該打百下手心。人間何處來的，似乎兩面都不能收場；在我不懂事故的人看來，倒是給另外一些人拍手的。也許曹聚仁真的希望各方和平相處，他卻似乎不明白這已涉及到原問題。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向社會廣泛搜集魯迅的書信以求編輯出版。曹聚仁在附給許廣平的信中道：『其中有的是犯忌諱的，這忌諱除了政治上的觀點，也包括對個人的臧否。連鮑耀明也會在給魯迅的信中寫道：『曹先生立場似左右不討好，發表文字，常受人批評，殊值得同情也。』

曹聚仁與魯迅真為朋友，觀點立場上還是頗多分歧的。曹聚仁從《周書》印得很精緻，並努力保持著書信的原貌。信紙上的紅格、鈴印，榮寶齋的木刻畫信箋都被原樣呈現，讓讀者品味到周作人的雅趣。印章、榮寶齋的木刻畫信箋，知當問計、周作人八十一所書、壽則多辱、周作人作通事等。周作人很喜歡後兩種，信中用過的「壽則多辱」有不同的二枚，「啞人作通事」有陰陽文的三枚。

兩本周作人通信集

文林漫步

初冬的早上五點半，外面是黑暗隆咚的，對面住宅樓上的人都睡醒了，每天的早餐都是我早為他「定製」——一般是大米粥加煮雞蛋之類。一年四季，除去寒暑假與節假日外，沒有例外。比較辛苦的是冬天。雖然家中也有空調，因此打開，所以，到了數九寒冬之時，熱乎乎的身子從暖暖的被窩中爬出來，還是有些小冷的。又因為嫌麻煩，也不是每次做早餐都先將衣服穿好，因此，有時不免打顛甚至受涼。記得有一次我受涼了，禁不住咳嗽了兩聲，結果我兒子聽到了結果，他從臥室裏拿過一件毛線衣來給我，讓我在那一瞬間頭一暖。回想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們的早餐又是另一種處理方式——我們姊姊四人加上我母親，輪流起來做早飯，煮稀粥。那時候我多大？大概十歲。我大姐比我大一些，可也只有十五歲。為什麼要這樣安排？拿我父親的話來說，那是為了培養我們的勞動觀念。當然，這之外也一定還有讓我們分擔母親的辛勞的考慮：那時，我父親在一所鄉村中學任教，只有周末才回來。而我母親白天要工作，晚上單位有時還會組織學習，實在太辛苦了。

我迄今還記得大冷天還沒有讓到我做早飯，一頭鑽進矮小的廚房裏，點上拿藥瓶做的簡易油燈吹火做飯的情景，直熏得人眼淚汪汪。好的是，如果兩手落葉、修剪下來的樹枝。因為它們不是很乾燥，稍不留神，爐火就會熄滅，所以時常得將嘴巴湊近灶口，向裏面吹氣。那煙有時會反撲向灶口，真熏得人眼淚汪汪。唯的好處是，如果兩手發冷，可以伸進爐膛烤一烤。這樣的日子當然有些苦，但是，若干年後，當我插隊農村獨立生活的時候，又因為早就掌握了此類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又對父母不無感激。就我所知，有些知道我，就因為昔日在家太過嬌生慣養了，這也不懂。

當然，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情況——比如說，有的家庭是獨生子女，有的家庭是多子女，有的家庭經濟狀況更好一些，有

：美術愛好者要看的是那裏多姿多彩、神態各異的塑像；有歷史考據的人，想憑衆多歷史名人的最後歸宿；文學愛好者則欲一了拜謁果戈理、契訶夫的夙願。作為俄羅斯文化的研究者，這幾個願望我都兼而有之。

參觀前兩天，莫斯科科大起紛紛揚揚的大雪，氣溫降至零下二十五度。我抵達公墓時，整個墓地鋪滿了雪；下午太陽破雲而出，積雪融化，墓間小路流水潺潺，我們穿的低靿皮鞋不防水，走起路步履維艱。墓碑蒙上雪花，要看清還得用手拂拭。一個下午，能看到的很有限，只好隨緣，走到哪兒看到哪兒，也因此，肖斯塔科維奇墓，奧伊斯特拉赫墓，安德列·別雷墓，都失蹤了。

同行的一個年輕人問：這個公墓葬的是什麼人？其實當時我也不大了，因為剛見到赫魯曉夫、莫洛托夫、米高揚、王明、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努耶娃以及其時剛下葬的戈巴爾巴喬夫的妻子賴莎的墓，遂含糊糊地應道，好像以失意政客為多。手邊缺乏有效的參考資料，只能憑印象大致說。上月，買到瓦西里·拉帕和達維德·菲克斯合著的《新聖母公墓》（莫斯科、聖彼得堡涅斯托爾歷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一書，十餘年的存疑算是解決了一些。

這部書附有一個「全體墓主名錄」，我粗略算了一下，有七千多人。這個目錄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中國人熟悉的王明及其妻子孟慶樹就不在其中，原因不明。新聖母公墓建成於一九二三年，前此離世的人物，都是以後遷葬的；也有人如歌唱家夏里亞賓客死異國，但遭歸葬祖國。一個已近百年的公墓，至今入葬者不足一萬，足見有很嚴格的管理措施。很遺憾，這好像與此書無關，因此不談。

我把入葬者的職業作了分類，國務活動家、將軍以上的軍人、高級黨務工作者為官員，其他另作一類。前者約佔入葬者的五分之一。

赫魯曉夫墓

赫魯曉夫墓

（網絡圖片）

這部書收集了一九六〇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六年多時間內二人通信，其中周作人的四百零二封，鮑耀明的應該也在此數目。信以時間為中間還穿插以周作人的日記摘錄做書信的註解。據說，此書出版後，遭周氏後裔強烈反對，出版社和書店无奈，只好不計較了。

最令人矚目的還是衆多的名作家、演員、音樂家，在俄羅斯的諸大墓園中首屈一指。可見，至少就新聖母公墓來說，官位的現象還不嚴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獲得的尊重起碼不亞於昔日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從塑像的藝術性來說，歌唱家和舞蹈家（如夏里亞賓和烏蘭諾娃）比官員們儼然巍然的標準像要有想像力得多。建造這些塑像，屬於個人行為還是公家行為，同樣不得而知。

幾個有趣現象

閱讀時，我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從中也許可以反映出俄羅斯獨特的國情。首先，公墓葬有五六十個蘇聯時代在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方面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儘管他們到今天已不大為人所知，畢竟反映出蘇聯能夠躋身於世界強國，並非沒有原因。與之適成對比，是俄羅斯——蘇聯的五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卻無一下葬此地。其次，有超過三十個生前職業為「試飛員」的墓地，從卒年來看，多數是善終。這些試飛員的軍階不會高到哪兒去（人類最早航太成功的宇航員加加林中校，因試飛失敗而亡，他的骨灰安置在克里姆林宮城牆，政治規格在當時要高於新聖母），卻因其犧牲精神獲得了社會的尊敬，在身後與蘇聯元帥和空軍主帥們分一席地。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米格」、「伊爾」、「圖」之所以能夠翱翔長天，離不開他們的貢獻。最後，此地有職業為雜技演員很難與作家、演員和學者相提並論，但俄羅斯人對他們的尊敬並不因此而稍減，古洛夫家族身後能座骨於此，就是一個明證。這究竟究有一個審批核准的過程，不是隨便任何一個馬戲團小丑都能與烏蘭諾娃共眠一地的。

在這部書中我找到了一個失蹤已久的歷史名人，雖然他的職位並不顯赫，但卻出現在多部蘇聯電影中，舉凡會面謁斯大林的蘇聯黨政軍要人，日後撰寫回憶錄的話也大多提到他。這就是曾任斯大林機要秘書的波斯克列貝舍夫。他在電影中年紀不大，四十歲左右，穿一件綠色軍便服，腳蹬高筒皮靴，雖然身體已微微發胖，但仍不失精明幹練，任何面譯最高統帥的人首先要過他這一關。我曾在一部回憶錄中讀到，波斯克列貝舍夫在斯大林晚年被罷黜。書中這樣提到他的歸宿：

「順便說一句，就在這一排，但稍往裏走，就是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波斯克列貝舍夫（一八九一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墓地）約·維·斯大林實際上最無可取代和有無限權威的私人秘書，他在自己的首長死前不久失寵，但仍熬過了十三年……」

這是我所能讀到的唯一記載波斯克列貝舍夫晚年的記載。像他這類人被罷黜後因知道的內情太多，往往難逃一劫。斯大林的暴卒令他多活了十三年。此人這十三年都在哪兒，幹了些什麼，留下回憶錄了嗎？作者在文中刻薄地使用了俄文「чертова дюжина」的成語，其中的貶義色彩中文無從表達。

二〇〇三年以來，新聖母公墓又遷入了一批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中，有俄羅斯聯邦的第一任總統葉利欽、經濟「休克療法」的首倡者蓋達爾、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女詩人阿赫馬杜林娜等等，這些人物，我們都不陌生。

電台至今固然仍在轉播大提琴家的演奏，女詩人的詩和散文也並非全無知音。當然，這個原來就已十分逼仄的圈子，眼看就已「人滿為患」。

當局如何應付，書中照例不着一詞。這個擠滿了大人物的地方對於我們仍然謎團重重，一如蘇聯七十四年的歷史，儘管出現了無數的解密檔案和揭秘文章，仍然是說不盡理還亂。

二〇〇三年以來，新聖母公墓又遷入了一批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中，有俄羅斯聯邦的第一任總統葉利欽、經濟「休克療法」的首倡者蓋達爾、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女詩人阿赫馬杜林娜等等，這些人物，我們都不陌生。書中收集了一九六〇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六年多時間內二人通信，其中周作人的四百零二封，鮑耀明的應該也在此數目。信以時間為中間還穿插以周作人的日記摘錄做書信的註解。據說，此書出版後，遭周氏後裔強烈反對，出版社和書店无奈，只好不計較了。

書中除了放鬆、率真，不做作，大約也有內心的坦露，面目顯露吧。因為周作人頗有興趣，聽說《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這本書，便興奮起來，都折價的新書來說卻是高價了。他的日本妻子頗多抱怨。他的周作人身上頗多的不快，甚至有點擠壓的捲，讓我的心裏也有點不平整。不過讀了幾頁，立刻覺得一切全可不計較了。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屋及烏，他對當時對周作人不利的因素多是抵觸的，加之與一個人關係過於密切，也張不開嘴。對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雖說「無須再在此喋喋」，但筆墨的輕重還是傾斜於維，實在有違他的「不辯」之說。對當時一些當紅的人物也頗有譏諷，這些言辭大約都令後人難堪並容易招惹不必的非議，從而不希望此書流布民間。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屋及烏，他對當時對周作人不利的因素多是抵觸的，加之與一個人關係過於密切，也張不開嘴。對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雖說「無須再在此喋喋」，但筆墨的輕重還是傾斜於維，實在有違他的「不辯」之說。對當時一些當紅的人物也頗有譏諷，這些言辭大約都令後人難堪並容易招惹不必的非議，從而不希望此書流布民間。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屋及烏，他對當時對周作人不利的因素多是抵觸的，加之與一個人關係過於密切，也張不開嘴。對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雖說「無須再在此喋喋」，但筆墨的輕重還是傾斜於維，實在有違他的「不辯」之說。對當時一些當紅的人物也頗有譏諷，這些言辭大約都令後人難堪並容易招惹不必的非議，從而不希望此書流布民間。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屋及烏，他對當時對周作人不利的因素多是抵觸的，加之與一個人關係過於密切，也張不開嘴。對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雖說「無須再在此喋喋」，但筆墨的輕重還是傾斜於維，實在有違他的「不辯」之說。對當時一些當紅的人物也頗有譏諷，這些言辭大約都令後人難堪並容易招惹不必的非議，從而不希望此書流布民間。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屋及烏，他對當時對周作人不利的因素多是抵觸的，加之與一個人關係過於密切，也張不開嘴。對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雖說「無須再在此喋喋」，但筆墨的輕重還是傾斜於維，實在有違他的「不辯」之說。對當時一些當紅的人物也頗有譏諷，這些言辭大約都令後人難堪並容易招惹不必的非議，從而不希望此書流布民間。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